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西方古典学研究

古典历史研究史

(下卷)

晏绍祥 著



Historiography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Volume I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4011382

K091
13
V2



古典历史研究史

(下卷)

Historiography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Volume II)

晏绍祥 著



北航

C1697551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091

13

V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历史研究史. 下卷/晏绍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1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2994-1

I. ①古… II. ①晏… III. ①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2582 号

书 名: 古典历史研究史(下卷)

著作责任者: 晏绍祥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994-1/K · 097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057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 开本 27.25 印张 447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

2 古典历史研究史(下卷)

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目 录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1
-------------	---

第一章 战后三十年英美等国古史研究的繁荣	1
一 古史研究基础的扩大	2
二 芬利对现代化派古史学的批判	16
三 线形文字 B 的释读与早期希腊史研究	20
四 古典时代希腊史研究的繁荣	33
五 雅典与斯巴达	41
六 马其顿与希腊化史	51
七 罗马共和国史研究	57
八 罗马帝国史研究的深入	74

第二章 战后西欧大陆国家的古史研究	93
一 战后法国的古史研究	93
二 联邦德国古史研究的复兴	123
三 意大利与罗马史研究	153
四 西欧其他国家的古史研究	166

第三章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英美等国的希腊罗马史研究	181
一 史料整理步伐的加快	181
二 考古学的变化与经济史研究的新尝试	187
三 对雅典的赞美与对斯巴达的批评	198
四 马其顿与希腊化史研究的新趋向	205
五 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影响的扩大	210
六 整体与个体,深度与广度	214

2 古典历史研究史(下卷)

- 七 罗马社会经济史研究 221
- 八 对罗马扩张史的新认识 228
- 九 早期罗马与罗马共和国史研究 237
- 十 罗马帝国及其行省 252

第四章 近三十年来西欧大陆国家的希腊罗马史研究 273

- 一 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 273
- 二 希腊史研究(上) 285
- 三 希腊史研究(下) 294
- 四 早期罗马与罗马共和国 314
- 五 罗马帝国史研究一览 330

第五章 新世纪,新取向 342

- 一 古代史: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 342
- 二 新世纪,新民主? 354
- 三 希腊化世界 371
- 四 罗马共和政治:有关政治文化的辩论 374
- 五 家庭、性别与社会 381
- 六 古典世界的自我与他者 384
- 七 晚期古典世界 391
- 八 古典传统研究 394

结 语 399

参考文献 411

索 引 414

第一章 战后三十年英美等国古史研究的繁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80 年代的大约三十年中,西方基本处于和平状态,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其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获得了较大发展,政治逐渐走向健康和稳定,从而为古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经济和技术条件。同时,英美以及其他英语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英语也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最为重要的学术语言。因此本章的内容实际也涉及以英语为母语写作的部分学者的著述。

在历史哲学领域,除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外,影响较大的有存在主义哲学及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轴心期”理论。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的文化与思想革命大体发生于公元前 8—前 3 世纪,这一时期各大文明区如中国、印度、希腊,都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奠定了以后文明发展的基础。^① 这套理论无疑抓住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某些特点,得到一些史学家的青睐。著名学者埃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 1923—2010)就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轴心期”文明产生的原因、动力与特点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论文集。作者包括萨拉·汉弗里(Sarah C. Humphreys)、克里斯蒂安·迈耶(Christian Meier)等知名的古史学者。^②

另一个趋向是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经济学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在 20 世纪前期不太受欢迎的德国经济学家布彻尔、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经过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1916—2003)的改造与发展,在战后英美古史学界大行其道。在罗斯托看来,所有前工业化的社会都属于传

① 俞新天、魏楚雄:《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史学理论》1988 年第 1 期,第 119—121 页及同期二人的译文《轴心期》,第 122 页以下。

② S. N. Eisenstadt(ed),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 Age Civiliz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统社会,即商品生产与交换不够发达的社会;工业革命后的西欧才转变为以交换为基础的近代社会。它恰当地指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古典世界与近代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间的差别,得到不少古史学家,主要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学者的重视,成为他们反对古史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武器。

年鉴学派的方法在战后也逐渐渗入古史研究中,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关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发展的三个时段的划分,成为不少学者的追捧对象,他们转而重视气候、环境等长时段因素对古代历史的影响;人口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等方法被广泛采用,使战后英美古史研究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一 古史研究基础的扩大

战后英美古史研究的特点,首先是古史研究基础的扩大,考古、碑铭、纸草文献、钱币学等辅助学科的成就为史学家们提供了较以前更多的资料,研究方法也逐步完善。

考古学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益不少。大战期间,盟军为了作战的需要,广泛运用了空中侦察技术,获得了大量古典文明区的历史地理资料,并发现了以前不太为人注意或在地面不易发现的一些遗址。战争结束后,它们成了新的考古活动的场所。英美设在雅典、罗马的考古研究机构,在意大利、西西里、希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等地,从事广泛的考古发掘活动,有些大学还组织了专门的考古队从事某一特定遗址的考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掘活动更具系统性与科学性,19世纪那种乱抢滥挖的现象被禁止。考古学者们密切合作,从事一些大范围的综合考古活动,如英国学者在伊达拉里亚南部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搜集了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材料,并按地层法分类研究,弄清了这一地区不同时期,包括前罗马与罗马时期的居民分布情况。在方法上,地层分类法被广泛采用,空中摄影与照相技术被引入,甚至进行水下作业,打捞沉船遗物,使人们对古代的商品交易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在对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的遗址进行考古研究的过程中,由布列根领导的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考古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希腊政府的合作与支持下,布列根从1939年开始,在美塞尼亚西南部传说中的涅斯托耳的派罗斯王宫进行发掘活动。4月4日第一天的发掘就有了惊人的发现,找到

了城墙的遗迹,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得到了几块刻有文字的泥板文书。这是在希腊大陆上首次发现线形文字泥板。在后续几个星期的发掘活动中,他们又得到了大量泥板文书。在对一座迈锡尼时代墓葬的发掘中,学者们得到不少金银、宝石、象牙之类的珍贵物品。所有这些物品都详细地进行了登记,然后运往雅典的国家博物馆,再加以清理、照相和编码。但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学者们中断了工作。1952年,考古队重新开始发掘,他们仔细清理场地、拍照,把所有遗址都画成图纸,对所有已发现的文物进行编码、登记。在前后13期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了大规模的建筑遗迹、墓葬、壁画、陶器和泥板文书。其考古报告共4卷5巨册,第1卷主要是考古发掘过程、遗址描述、器物分类与分析,第2卷为壁画,第3卷为墓葬、陶器及其他各类器物,第4卷是所有泥板的照片。在派罗斯发现的大量线形文字泥板文书,对解读该文字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在此之前,布列根还指导了特洛伊的发掘活动,并编写了4卷8册的考古报告。后来,安吉尔·汤普逊(Angel Thompson)等编辑了有关学者对特洛伊的研究成果,集成4册出版,大大推进了对希腊青铜时代的考古活动与研究工作。^②

英国考古学家库克(John Manuel Cook, 1910—1994)与土耳其学者阿库加尔(Ekrem Akurgal, 1911—2002)合作,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士麦拿(今伊兹密尔附近)进行发掘。在英国退出、库克发表初期发掘的报告后,从1966年开始,阿库加尔率领土耳其学者独立从事发掘活动。该城为小亚细亚最为古老的希腊人城市,公元前7世纪为吕底亚灭亡后被废弃,因此遗址保存相对完好。该城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揭示出从特洛伊第1期至公元前4世纪末的连续的文化层(其中公元前2千纪为空白),最繁荣的是古风时期。这一时期士麦拿建起了雅典娜神庙,并有了砖石结构的住房,还有大量的陶器,因而很好地展示了希腊城邦逐渐兴起的过程。该书已经成为研究公元前1千纪初小亚细亚希腊人城市兴起以及建筑、艺术的基本材

① C. W. Blegen, *The Palace of Nestor at Pylos in Western Messenia*, 4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1973.

② C. W. Blegen, *Troy: Excavations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32-1938*, 4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1958; Angel Thompson, *Troy, Supplementary Monograph*, 4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The Palace of Nest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1973.

料。由土耳其人单独从事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活动仍在继续中。^①

英国学者 1960 年代以来对勒夫坎地的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根据考古学家约翰·鲍德曼(John Boardman)的看法,公元前 8 世纪应当有一个优卑亚人在地中海上特别活跃的时期,尤其是埃里特里亚和卡尔西斯两城。在希腊人的传说中,也有所谓拉伦丁战争乃希腊世界第一次大战的说法。但他们的活动在考古上并未获得证明。因此英国学者选定据传为古代拉伦丁平原所在地的勒夫坎地进行发掘。在这一地区发掘出的遗迹与墓葬,显示出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优卑亚的繁荣与广泛的对外联系。大量的金银器物 and 陶器表明,在原始几何陶与几何陶时代,优卑亚与埃及、近东、雅典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并显示出在陶器生产上它所具有的优势。这不仅使人们对这一时期雅典始终在陶器生产上领先的说法产生怀疑,更重要的是,这里揭示出的从青铜时代后期到铁器时代早期连续的居住遗址、墓葬以及墓葬中的陪葬品,表明优卑亚一直与近东保持联系,从而对一直以来盛行的所谓希腊“黑暗时代”是否黑暗孤立提出了严重挑战。^②

此外,英国学者在克里特、迈锡尼、意大利和塞浦路斯的考古发掘活动在继续进行。但他们最有兴趣的还是不列颠,出版了大量专著,研究凯尔

① J. M. Cook, 'Old Smyrna 1948-1951',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53/54 (1958/1959), pp. 1-34; J. M. Cook and R. V. Nicholls, *Old Smyrna Excavations: The Temple of Athena*, supplementary vol. Series 30, London: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1998; Enkrem Akurgal, *Alt Smyrna I: Wohnschichten und Athenatempel*, Ankara: Turk Tarih Kurumu Basimevi, 1983.

② 有关考古报告已经陆续发表,共 4 卷 5 册,分别描述和研究了青铜时代的墓葬、铁器时代初期的建筑和墓葬、原始几何陶时代的建筑与墓葬等。学者们对考古资料的细心整理,显示了战后考古学在技术和研究手段以及研究过程中的科学性。见 M. R. Popham, etc. *Lefkandi I: Text, the Settlement and the Cemeteries*,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 No. 11, 1980; M. P. Popham, etc., *Lefkandi II, The Protogeometric Building at Toumba*, pt. 1, the Pottery,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 22, 1990; M. R. Popham, etc., *Lefkandi II: The Protogeometric Building at Toumba*, pt. 2, the Excavation, Architecture and Finds,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23, 1993; M. R. Popham, etc., *Lefkandi III: The Toumba Cemetery, the Excavations of 1981, 1984, 1986 and 1992-1994 Plates*,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29, 1996, pp. 193-205; D. Eveley, etc., *Lefkandi IV: The Bronze Age, the Late Helladic IIIC Settlement at Xeropolis*,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 39, 2006; Helen Waterhouse,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London: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1986, pp. 116-119. 中国学者对此有所反应,见黄洋:《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和希腊城邦的兴起》,《世界历史》2010 年第 3 期,第 32—42 页。

特、罗马时期不列颠各个城市的居民点、道路及罗马化过程等。这些著作都运用了大量考古资料。在此基础上,英国学者写出了一些综合性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瓦切尔(John Wachter, 1927—2012)的《罗马不列颠的城镇》、马加里(Ivan Donald Margary)的《罗马不列颠的道路》和《罗马西北边界》等。《罗马不列颠的城镇》研究了城镇的定义,它们在行省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不列颠的城市化进程,并对伦敦、坎特伯雷等城市进行了个案考查。马加里以伦敦为中心,详细介绍了罗马时代不列颠的交通、道路网、交通设施与维护等。迪沃因(David Divine, 1904—1987)则专门研究哈德良“长城”的军事意义,试图证明它是罗马历史上最有效的防御工具。^①

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在科林斯进行了广泛的发掘活动。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雅典研究院一直在那里从事发掘,其考古报告自1932年第1卷出版以来,未曾中断。现已出到18卷之多。报告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不同时期的陶器、建筑,也有各种专门研究。另外,美国考古队在原吕底亚王国都城萨尔迪斯的发掘从1910年开始,断断续续,取得了重要成果,揭示出从早期文明直到罗马、拜占庭时代的文化层,其考古报告在50年代先后出版。1958年,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又对萨尔迪斯进行发掘,分时期加以研究,并出版了综合性考古报告《从史前到罗马时代的萨尔迪斯》。纽约大学美术学院考古队在萨摩色雷斯进行发掘后,出版了大部头的考古报告,公布了他们所有的考古成果,如铭文、建筑、雕刻、陶器等,还包括一卷古代文献,这是它与众不同之处。^②

美国雅典研究院在雅典广场及卫城的发掘活动一直在进行。在广场的发掘始于1931年。那里是古典时代雅典政治、经济生活中心,议事会、将军办公处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建筑多在此处,因而对它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战后,美国雅典研究院成为唯一可在阿提卡从事考古活动的外国机构。他

① John Wachter, *Towns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Batsford, 1975 (2nd ed., 1995); I. D. Margary, *Roman Roads in Britain*, 2 vols, London: Phoenix House, 1955 (3rd ed, London: J. Baker); D. Divine,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Rome: A Military Study of Hadrian's War*, London: MacDonald & Co., 1969.

② H. N. Fowler (ed), *Corinth, Results of Excav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G. Hanfmann, *Sardis, from Prehistoric to Roman Tim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Karl Lehmann, *Samothrace: Excavations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Fine Arts of New York University*, 11 vol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8-1998.

们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发掘了众多遗址,出版了大量考古报告与著作。^① 肯普的统计表明前后有 40 部著作,400 篇论文,出自 110 人之手。以《雅典广场》之名出版的著作始于 1953 年,到 2006 年已经出到第 33 卷,每卷各有一个主题,如第 1 卷为雕刻,第 3 卷为与雅典广场有关的碑铭和文献,第 10 卷为度量器具,第 11 卷为古风与古朴风格的雕刻等。对研究雅典政治史而言,第 15—16 卷尤其具有价值,前者为与雅典议事会议员有关的铭文,后者为雅典国家颁布的各类命令等。该丛书实际汇集了广场从新石器时代到土耳其统治时期各个时代的各类专题资料,不少资料如陶片铭文等,系首次公布。它们为研究雅典广场与雅典城的历史,提供了大量原始文献,已经成为研究古代雅典乃至希腊历史之必备文献。其中较具综合性的,是汤普逊(H. A. Thompson, 1906—2000)的《雅典广场》以及韦奇来(Richard Ernest Wycherley, 1909—1986)和肯普(J. Camp)的同名著作。他们都曾长期在美国雅典研究院工作,参与并指导对雅典广场的发掘,因此熟悉那里的地形,并掌握着大量第一手资料。汤普逊的著作出版于 1972 年,既有广场早期和衰落的历史,也有不同地区的建筑、遗迹的介绍。韦奇来的著作主要是分地区介绍广场的古迹。肯普的著作出版于 1986 年,使用的资料较新,而且主要是历史的叙述与分析。它从新石器时代的雅典广场地区写起,经古风、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直到罗马帝国晚期结束。与一般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迈锡尼文化在雅典也未能存在,与其他迈锡尼文明中心一样崩溃后,雅典进入了黑暗时代,生产有所衰退;但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开始,雅典人口明显增长,公元前 8 世纪末再度出现衰落迹象,直到一个多世纪后又复兴。霍普(R. J. Hopper)的《雅典卫城》既有历史的叙述,又有古迹的介绍,出版后曾风行一时。^②

这一时期希腊碑铭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专题性铭文集的出版,其中较重要的有托德(Marcus Niebuhr Tod, 1878—1974)的《希腊历史铭文》和梅格

① 关于 1939—1980 年美国雅典研究院的考古与研究活动,见 Lucy Shoe Merit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pp. 175-220。

② 该丛书已经被收入 JSTOR 数据库,可以方便地下载。另见 H. A. Thompson, *The Athenian Agora*, Princeton: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1954 (2nd ed., 1962); R. E. Wycherley, *The Athenian Agora*, Princeton: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J. Camp, *The Athenian Agor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 R. J. Hopper, *The Acropoli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1。

斯、刘易斯(D. M. Lewis, 1928—1994)合编的《希腊历史铭文选》。

托德的铭文集共两卷,包括公元前6—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铭文,因希波战争前的铭文甚少,实际上主要是公元前5—前4世纪的铭文。该书初版于1933年,每篇铭文前面有铭文刻写的时间、概况介绍,后面有词汇与内容的讨论,其中征引了不少现代著作,因而对一般读者与专门研究者都有用处。1946年,托德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对该书修订后续出了第二版。梅格斯等的铭文选只编到公元前5世纪末,其目的是代替托德的部分著作。它包括11件新发现的铭文,对于托德原已收录的铭文,他们都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校注,因而该书关于公元前5世纪及之前的铭文,已经基本取代托德的相关内容,成为西方大学中的标准参考书。^①但因它缺少公元前4世纪的铭文,所以托德一书仍未失去参考价值。

拉比谢克(A. E. Raubitschek, 1912—1999)研究并公布了在雅典卫城所发现的铭文。在杰佛里(L. H. Jeffery, 1915—1986)的帮助下,作者对公元前6—前5世纪雅典卫城的铭文进行考证,恢复原文,并分析其意义,使该书成为研究雅典铭文的标准参考书。^②杰佛里可谓19世纪德国学者基希霍夫的继承人,她的《古风时代希腊的地方文字》,研究了希腊字母的起源、传播和书写材料,古风时代铭文的主题,字母的变化,特别是对希腊世界各城邦文字的起源与差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研究早期希腊铭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③此外,伍德海德(A. G. Woodhead, 1922—2008)的《希腊铭文研究》阐述了希腊铭文研究中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如字母的发展,铭文的定年、恢复、分类、与历史背景的关系,尤其介绍了铭文出版物。该书篇幅不大,出版后备受欢迎,所以1980年又出了第二版,并由作者作了适当的修订,补充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④

在罗马时代铭文研究方面,英美学者在各种杂志及著作中发表了大量

① M. N. Tod,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2 vols,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6-1948, 1985年将其合为一卷,并增补了书目;R. Meiggs & 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9.

② A. E. Raubitschek, *Dedications from the Athenian Akropolis: A Catalog of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ixth and Fifth Centuries B. C.*,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③ L. H. Jeffery, *The Local Scripts of Archaic Greec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1.

④ A. G. Woodhead, *The Study of Greek Inscrip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成果。但罗马铭文分布范围极广,数量亦多,蒙森的《拉丁铭文集成》基本囊括了罗马铭文,所以20世纪后期并无罗马铭文选之类的书出版。^①地区性的铭文集中,以罗马时代不列颠铭文的研究与出版较为突出。在由蒙森组编的《拉丁铭文集成》中,第7卷的1200件铭文全部取自不列颠。但因编者系欧洲大陆学者,不可能把铭文搜集齐全,有时亦不免张冠李戴,所以英国学者在蒙森的建议下,准备自己再编一部罗马不列颠铭文。这项巨大工程从19世纪末开始准备,经柯林武德、赖特(Richard Pearson Wright)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65年出版了第1卷。它包括约2400件刻在石头上的铭文,每件铭文都有发现地点、时间、现在的位置与状态、译文、绘图及研究性参考文献介绍,因而极便于学者使用。25年后,《罗马不列颠铭文》第2卷分8册出版。与第1卷相同的是,每件铭文都有译文、铭文状况及研究性书目介绍,但它主要是刻在诸如陶器等非石质器物上的铭文,时间上涵盖了1956—1986年新发现的一些铭文,两书互为姊妹篇,构成了较完整的罗马不列颠铭文集。^②

钱币学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从19世纪末开始,各大博物馆开始公布其收藏的钱币,战后这一工作继续进行。钱币学研究的方法也日趋科学与精确,甚至可以进行古代钱币生产的实验。

在战后希腊钱币学研究中,英国学者克拉伊(Colin Mackennal Kraay, 1918—1982)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独立或与人合作完成的著作中,《古风与古典希腊的钱币》、《希腊钱币》、《希腊钱币与历史》等在希腊钱币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古风与古典希腊的钱币》是一部希腊钱币发展史,概述了钱币从小亚细亚发源、传播到希腊世界各地的过程以及各城邦的钱币史,还涉及钱币生产技术与钱币定年。他认为铸币在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其他地区可能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初,厄吉那钱币的发行不会早于公元前575年,雅典铸币的发行不会早于庇西特拉图第一次执政,即公元前6世纪中期前后。这样,所有钱币的定年都

① 只有1934年牛津出版的巴罗的《拉丁铭文选》,因所选内容有限,而且缺乏必要和充分的注疏,并不流行。R. H. Barrow, *A Selection of Latin Inscrip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4.

② R. G. Collingwood, R. P. Wright, *The Roman Inscription of Britain*, Vol. 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S. S. Frere, etc. Vol. II, fas. 1-8,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0-1995.

较 20 世纪上半期古史学者们的定年晚数十年,从而给希腊历史一系列传统的解释,例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梭伦币制改革的记载,提出了严重挑战。在一系列著作与论文中,克拉伊还讨论了钱币的功能,强调早期希腊钱币缺少小额辅币,其发行与流通受到政治的很大影响,经济因素相对次要,对 19 世纪末以来将商品货币关系连在一起的看法,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他的这些看法得到了包括斯诺德格拉斯(A. M. Snodgrass)等在内的不少学者的支持。^①

在雅典钱币史研究中,汤普逊(Margaret Thompson, 1911—1992)的《雅典新式银币》具有重要地位。作者系美国钱币学协会希腊钱币部主管,此前已经发表过众多有关论文,并且编辑了在雅典广场发现的钱币。该书集中研究了公元前 2 世纪雅典所发行的钱币,第 1 卷进行描述与分析,第 2 卷为图版。用书评人的话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基于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料,它也产生了大量新的信息”。作者网罗到 7000 件左右的钱币标本,且每种钱币都有准确的定年,因此该书的 200 多幅图版尤其有价值,让读者直接接触到第一手资料,并能够据此对公元前 2 世纪雅典的政治、经济和人物进行系统研究。^②

在罗马钱币史研究中,克劳福德(Michael Hewson Crawford)集中研究罗马共和国的钱币史。他的《罗马共和国钱币窖藏》在前人基础上,汇集了当时所能利用的资料(共 567 处窖藏和 48 处其他的发现),分析了罗马钱币的类型,并给共和国时代的钱币排定相对和绝对年代(18 幅图表给出了所有窖藏的分布和年代)。作者长期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不少钱币都经过他本人的亲自核对,因此无论是定年还是结论,都更具权威性。他关于罗马第纳里首次铸造于公元前 212 年的结论为学界普遍赞同,并推翻了此前有关该类型货币的定年。他的两卷本《罗马共和国钱币》可谓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概述了罗马铸币的起源与发展,研究了铸币的铸造技术、标准、类别、管

① C. M. Kraay,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Coin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6; *Greek Coins*,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66; *Greek Coins and History: Some Current Problem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9. 但请参看 Alain Bresson, 《吕底亚和希腊铸币的起源:成本和数量》,沈扬、黄洋译校,《历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149—160 页。

② M. Thompson, *The New Style of Silver Coinage of Athens*, 2 vols. New York: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1961; 评论见 *Phoenix*, vol. 18, No. 3 (Autumn, 1964), pp. 243-245; *Gnomon*, 35. Bd. H. 1 (Mar. 1963), pp. 84-88.

理、钱币发行与罗马财政的关系等。该书较过去的创新之处,首先是作者访问过众多博物馆,亲自接触过他的研究对象,因此对钱币的描述更加准确;其次,他对共和国时代几乎所有的钱币都重新确定了年代,包括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利用钱币研究罗马经济史。他成功地证明,罗马第纳里的发行量与罗马军队的活动强度成正比,也就是说,罗马铸币的发行未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像在希腊一样,是军事和政治意图,从而切断了货币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直接联系,由此引起了有关罗马钱币性质、作用以及罗马经济特征的激烈争论。无论是对研究罗马钱币本身,还是罗马经济与政治,都具有积极意义。^①

格兰特(Michael Grant, 1914—2004)分析了罗马帝国钱币发行与罗马显赫人物或重要事件的关系,就帝国而言,主角自然是皇帝,因此该书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皇帝驾临”,中间涉及钱币与皇帝的宣传,所以该书并非真正的罗马帝国的钱币史,而是帝国发行的钱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在“周年纪念币”部分,这个主题得到了恰当的表达。但对于那些不曾深入研究过罗马钱币学的读者,阅读该书有一定难度。^② 萨瑟兰探讨了罗马帝国初期,尤其是朱利亚—克劳狄王朝的政策及其与钱币的关系。他的目的是向读者指出钱币作为古代史资料的重要性,因为钱币既数量众多,而且正式和一贯。他随之提供了一系列钱币图版,并从历史角度加以解读。但他最终的结论仍然比较谨慎:钱币作为资料,固然有它的长处,但它所提供的信息却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全面的,其使用的话语也笼统和模糊,而非具体明晰。萨瑟兰的尝试更多地不是表明了钱币作为历史资料的功能,而是它的局限。他对奥古斯都钱币的研究至少说明,脱离了狄奥和奥古斯都的自传,钱币不大可能独立提供多少信息。^③

① M. H. Crawford, *Roman Republic Coin Hoards*, London: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1969; *Roman Republic Coinage*,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评论见 Andrew Burnett, 'The Changing Face of Republican Numismatics', *JRS*, vol. 77 (1987), pp. 177-183; *Phoenix*, vol. 24, no. 4 (Winter, 1970), pp. 357-359;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75, no. 2 (Apr. 1971), pp. 230-232; *Gnomon*, 43 Bd., H. 3 (May, 1971), pp. 266-271.

② M. Grant, *Roman Imperial Money*, London: Thomas Nelson, 1954; *Roman Anniversary Issu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③ C. H. V. Sutherland, *Coinage in Roman Imperial Policy*,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1.